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5年2月2日

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

(上接第1版)

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把改革看作是浙江的活力之源，他高度重视抢抓战略机遇期，提出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用得好，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他大力倡导在各项改革中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超越原有的体制障碍，从根本上冲破束缚发展的桎梏。他提出，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同时，要正确处理改革与规范的关系，避免先改革后规范、先发展后整治的被动局面。要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新优势。

对浙江的改革，他提出要深入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配置资源问题。加快劳动力、资本、产权、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消除城乡、行业、部门和地区的壁垒，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二是加快非经济领域的改革问题。着力推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以及其他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三是发挥政府作用问题。把“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有机结合起来，“补缺位、退越位、抓到位”，善于统筹规划，善于宏观调控，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切实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提出要步步为营，年年有成，积小胜为大胜。强调要善作善成，处理好部署与落实的关系；要再接再厉，处理好坚持与深化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强调我们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习近平同志坚持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他指出，浙江正处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他借用“地瓜理论”对此作了生动论述：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并非资源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多次论及改革开放，指出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处理对外开放中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只有既从现实又从历史两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对外工作做得更好。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阐释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历史背景、现实根据、科学内涵、实现途径，鲜明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工程极为宏大，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要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他强调要防止“改革与我无关，开放离我很远”的错误认识。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蹄疾步稳务求实效。在贯彻落实上，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确保实现改革的目标任务。要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少思想观点都是对他以前相关论述的凝练、发展和升华，是他多年思考和实践的结晶。我们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的思想和论述，深入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同心同德、凝神聚气，不断把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作者兼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理论研究

构筑群众路线长效机制



□武风华

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在我们党全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共产党执政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还是国家机关施政，都必须坚持贯彻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加强作风建设无尽期。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构筑起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索。

在党的制度建设层面上，坚持群众路线要与完善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党的生活中，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在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过程中，既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问题，也存在着集中不得力的问题。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广大党员畅所欲言，讲真话，讲实话，才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为决策层输入客观的民意信息；实行正确的集中，注重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性，如决策程序、议事规则、表决方法、监督检查等，增强民主集中制内容的可操作性；健全民主集中制监督机制，加强领导班子内部对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监督，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对贯彻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并将结果运用到考察评价领导班子和使用领导干部的过程中。

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上，坚持群众路线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要完善人大代表的构成，提高基层代表比例；要强化各级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识，使之经常联系本选区选民，准确反映他们的要求，真正代表人民直接行使好国家权力；要强化地方人大决议和决定的法定约束力，避免换一任领导更改一套思路。

在社会制度建设层面上，坚持群众路线要与发展广泛多层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结合起来。这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又一重要政治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重要论断，还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就将群众路线纳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范畴，使群众路线获得新的政治意义和制度保障。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要拓宽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协商，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

在决策制度建设层面上，坚持群众路线要与完善科学决策制度相结合，建立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公众的参与是政策合乎民意的根本途径，重大政策出台前，要通过网络等各种形式进行民意调查，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要充分体现人大常委会、监察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制衡作用。在决策程序上，政府在决策前要实行政务公开，发扬民主，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决策时要坚持公平、公正、尊重科学，选择最优方案；决策实施后要实行决策跟踪反馈，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要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新时期论坛

中华传统美德话语表达的现实借鉴

□窦竹君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需要将中华传统美德“讲清楚”，因而，道德话语表达至关重要。而我们的祖先富有道德建设大智慧，应该汲取祖先留下的智慧营养，借鉴其表达古为今用。

>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需要将中华传统美德“讲清楚”，因而，道德话语表达至关重要。
>
> 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存在着道德术语凝炼不够，话语表达过分“高大上”，缺乏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应借鉴传统美德表达智慧古为今用。

中华传统美德的话语表达智慧

话语表达以人为本，符合人性基本要求，尊重人伦价值观念。人生在世，总要面对生老病死问题，“孝”“慈”观念既能维系亲情又兼具养老功能，满足了人心底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渴望。又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本社会关系调整规范的表达方式，体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期望的和谐社会关系内在要求。这些表达非常符合人性基本需求，自然能够深入人的内心，也就能很快地被普遍性接受。

简单明了，琅琅上口，容易记忆。话语表达是要深入人心的，不是为了孤芳自赏卖弄显摆，如果其表达言语繁琐，拗口难懂，必然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中华传统美德深知这一点，其表达简单易记，琅琅上口，非常有助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仁、义、孝、悌、德、俭、勇、耻、礼、智、信、天理、良心等基本观念，深入浅出，无论贤愚老幼皆能迅速接受。再如传统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弟子规》《朱柏庐治家格言》等都琅琅上口，世人皆能信口拈来，其传达的道德观念信息自然容易深入人心。

道德观念话语表达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传统中国道德观念，从提出之后就未有大的改变，后世儒家可以阐释丰富，但未有大的“创新”，足够的稳定性有利于人们接受道德观念。否则，今天一个概念，明天一个理论，搞得人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必然对此置之不理，弃若敝屣。

道德观念生活化表达。传统中国道德建设基本路径是道德生活化，即将道德基本要求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进而习惯成自然，道德建设也就在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得以实现。因此，生活化表达是极为重要的方式。北宋名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居家杂仪》明确每天子媳起床后要先省问父母（当然不是让我们生搬硬套），“父母姑舅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做好饭后，“妇请所欲于家长，退具而共之”。到了晚上，“父母姑舅将寝，则安置而退”。父母有病，“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返必面，容貌要恭敬，出入起居谨慎扶卫。《朱伯庐治家格言》更是涉及生活各个方面：“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种生活化表达也是《朱子治家格言》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道德观念层次性表达。针对不同对象，道德观念的表达是不同的。对于读书人，其表达“学术性”较强。如清乾隆七年郑之侨为鹅湖书院订《壬戌示诸生十要》，其中要求学子衣着端庄是这样表达的：“士子读书乐道，淡泊宁静，悃愊无华，亦何必修饰衣冠以至骜外而鲜实。然衣冠者所以摄其心志也。衣冠不肃，心志之惰慢可知矣。”而对于童蒙，道德观念表达则要具象化，如朱熹所订的《童蒙须知》：“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凡写字，未问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老草。”显然对于刚刚开始读书习字的蒙童来说，这样通俗化表达更加明白实用。明代思想家吕坤专门针对幼儿编写了系列《小儿语》，用儿歌教导幼童如何做人。如“宁好认错，休要说谎，叫人识破，不当人养”，“见了财物心喜，做贼从此做起”，等等。而对于乡野村夫村妇，则更加口语化甚至土语化。清乾隆年间湖南永兴张氏所定《永兴张氏合族禁条》议定：“议耘田后不许摩螺摩鱼，以及张筌张鱼，亦不许牵牛在洞中牧看，有害田塍。违者，罚钱一千文。”明显带有方言土语。实际上层次性表达还表现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如同样是戏曲，针对读书人阶层的昆曲与面向乡野村夫的地方小戏就有着很大不同。地方小戏唱词极为通俗，就是老百姓大白话。正是这些不同的层次性表达，让不同阶层的人们接受了同质的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民俗化表达。春节晚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拜祭祖先，清明祭祖等等都传递着孝的观念。明清时期北京城较大商号，过年都在廊下挂满纱灯，所有纱灯都绘有“二十四孝”、伯牙摔琴、曾子杀彘、范张鸡黍等各种故事。人们观灯娱乐之际同样润物细无声地接受着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美德表达智慧，特别是生活化、层次化、民俗化表达方式，实际是儒家道德观念世俗化体现，而这种世俗化恰恰是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是道德观念接地气表现方式，其载体为家训家规、村规乡约、行规行约、书院规章、蒙学读物、儿歌童谣、会社规约、各类戏曲、各种民俗、民间俗语等等。正是这些创造性转化，使道德观念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教条，而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观念，不仅使道德规范润物细无声地得以实现，也形塑了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

传统美德表达智慧的现实借鉴

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存在着道德术语凝练不够，话语表达过分“高大上”，缺乏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应借鉴传统美德表达智慧古为今用。

对历史上传承的道德观念表达术语进行梳理，对于人们已然普遍接受烂熟于心的道德术语应该继续沿用，以保持话语表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尽量不要用“创新”的语言代替。至于这些术语表达的内容，可以丰富甚至修正，以当代价值观改造之，旧瓶装新酒。另外，注重道德话语表达的简洁性，尽量用最贴近百姓生活、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越简单明了越容易深入人心。其实当代也不乏这种表达的范例，诸如“为人民服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简单明了深入浅出，又含义深刻。这就要求进一步凝练道德术语，切忌为“创新”而“创新”，以似是而非的术语忽悠大众。

加强生活化表达。一是对于先人留下来的优秀的生活化表达方式，如《朱柏庐治家格言》《居家杂仪》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鼓励民间以此为家训传承家风。传统中国许多家庭都以此为家训，如著名的山西王家就坚持“法司马训”。二是支持民间制定家训、村规民约等民间规约，在民间规约中融入生活化表达。三是优秀蒙学读物要进课堂，在学生守则中将道德要求具象化。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学校门口置一面镜子，镜上箴言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个学生到这儿都要照一照，从容貌到内心进行净化。这是具象化表达很好的范例。四是在市民守则之类的公共规则中将道德观念具体化、具象化。真正做到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以习惯促自然，实现道德生活化。

注重层次化、民俗化表达。一是在家训家规、村规乡约、学生规则、市民规则等表达载体中根据不同群体对象，语言表述要大众化人性化，避免口号化。二是挖掘整理儿歌童谣、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中传播道德的内容。如民间曾经广为流传一首歌谣“老来难”，对传播孝道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类儿歌童谣、民间歌谣、民间故事近年来有被湮没风险。应当大力挖掘整理，以新形式包装传播。三是采取措施支持地方戏曲发展，重视地方小戏在道德传播中的地域作用。四是注意利用影视、微博、微信、动漫等新媒体创新道德表达形式，这也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家风”节目就是这方面典型。五是在节日中倡导恢复某些礼仪，发挥民俗在道德传播中无形作用。

